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百 家

林 语 堂 作
代 表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程 丹 编选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 - 5080 - 1557 - 6

I . 林… II . 中… III .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 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44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 销

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3 印张 310 千字 4 插页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100 册

定价: 1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编 舒乙

副主编 吴福辉 周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今 周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乙 樊骏

目 录

散 文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3
给玄同先生的信	5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10
萨天师语录	14
祝土匪	34
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	37
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42
讨狗檄文	46
忆狗肉将军	50
谈言论自由	53
论政治病	58

中国的国民性	61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68
论语丝文体	71
读邓肯自传	77
论幽默	86
谈中西文化	93
论孔子的幽默	100
孟子说才志气欲	105
论孟子的文体	108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111
谈牛津	118
再谈萧伯纳	124
萧伯纳一席谈	129
读书的艺术	132
论读书	138
冬至之晨杀人记	146
中国有臭虫吗	150
女论语	153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158
论看电影流泪	164
冀园被偷记	168
说避暑之益	174
阿芳	177
我的戒烟	181

春日游杭记	185
记春园琐事	190
买鸟	194
秋天的况味	199
庆祝旧历元旦	201
论裸体运动	205
论趣	209
说乡情	212
论赤足之美	214
论买东西	217
记鸟语	220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223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226
瑞士风光	229
说斐尼斯	232
杂谈奥国	237
一团矛盾	241
大旅行的开始	246
《剪拂集》序	267
《大荒集》序	270
《吾国与吾民》自序	272
《吾国与吾民》收场语	274
《生活的艺术》自序	278

剧 本

- 子见南子 285

文学传记

- 苏东坡传(节选) 309

- 林语堂小传 407

- 林语堂主要著作书目 409

散 文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讥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

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猛进》第三期答鲁讯语）。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中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洋，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嘲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岂明先生已经说过：“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语丝》第十九期）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提倡“精神复兴”我觉得是今日言论界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二五，三，二十九。

选自《剪拂集》，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初版。

给玄同先生的信

玄同先生：

我刚刚读过你的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来插说几句，也借此可以聊补我对于《语丝》逃懒足足两个整月之过。近来正想做一点文章，适来了先生潇洒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题目没有了。

未入正题，先说一句闲话：半农先生的信里头有一句恭维先生的话而为先生所璧还者（我是先读先生之“璧还”，然后读半农先生之原璧）。半农想念启明先生之温文尔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先生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案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于自夸，姑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戴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戴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现代评论》固冠冕堂皇威仪棣棣的学者无疑，且不失其“业与去与几”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进，温文尔雅不必限于《语丝》。此亦犹厚眼镜（学者之象征）不必为尹默先生所独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的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象”的话，说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惟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

中国人”(即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的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通共有一位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他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捧场，助祭，做挽联，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希望。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略，国民会议略，护宪略，拒贿略……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为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的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先生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

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复兴解做“复兴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两个反对理由。第一，此种扭扭捏捏三心两意的办法，终觉得必无成效。且若我们愿意退让以求博一般社会之欢心，则退让将无已时，而中国之病本非退让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后可耳（试以日本维新时代态度与中国革命后态度比较一下此点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无复兴之价值，尚在不可知之数。就使有之，也极难捉摸，不如讲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也。或者唐宋中国人不如两汉中国人，两汉中国人不如周末中国人也不一定，如是则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复者，故周末尚可出一个孟轲讲“善养吾浩然之气”，及墨翟之讲兼爱，此乃其时精神未死之证。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总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然既一厄于儒、墨之争，再厄于汉时十四博士之经学，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学（《大学》、《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书”是中国人之成败类自宋朝始之证），古人之精神已一无复存，此种之精神复兴恐怕不容易讲吧，除非有一位费希特来重新替我们讲给我们听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识浅陋，

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马跑得太远了，赶快收束吧。总而言之，我近来每觉得精神复兴之必要，因为无论国事或教育，所感觉进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种颓丧习气之空气，在此空气中，一切维新都可变出唱戏式的笑话。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政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愦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愦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尝思精神复兴条件适足以针砭吾民族昏愦、卑怯、颓丧、傲惰之痼疾者六，书于左方以待参考，不复多赘（这也可谓不识时务之我的一点鄙见，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2. 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还敬他一口）。
3. 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不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而去而已，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
4. 不悲观。
5. 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然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屏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孙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请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玄同先生：因为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诌了一大堆的废话，未知

有当否，然这回我对于《语丝》的义务可尽了。顺颂“欧”安，并问
“化”祺，不宣。

一九二五，四，七，弟语堂。

选自《剪拂集》，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初版。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在中国枯燥的生活中，有两类动物是乐观的。因为他们的舒服是真的，快乐是真的，所以不能引起我们不舒服的人偶然的同情，而且因为在四面楚歌之时，竟有人敢唱起空城计来，就使不足以鼓起我们的勇气，也至少可以使我们开开心。但是我觉得中国果有振兴之时，此两类怪物非放之三危，殛之羽山不可。这两种怪物，不用说的，就是遗老与遗少。

空城计何以唱不得

有人问：他们快活，也就让他们快活，何以诛殛他们之必要？这是根本不明白今日事实的人所必有的怀疑？其实，在四面楚歌时候，有人唱唱空城计让大家开开心，也未尝不妙。遗老遗少的乐观，若当做玩意看，未尝不可开心，因为他有一种风趣，同看疯人在街中唱打鼓骂曹，或者跟一个浑身褴褛的叫化子竟天嘻笑一样的神秘。但是倘使有一位戏迷，不但要去大街上唱他的戏迷曲，并且要强迫全路的行人同他合唱，那就未免有点“扰乱治安”的嫌疑，“为法律所不许”的了，也只好送入疯人院妥当。倘是有人不但躬体力行其乐天主义，并且要劝告全国的青年与他一样，且美其名曰乐观，曰不谈政治，曰读书救国，我们却不能不提出反抗，因为果使全国的男女青年能像他们的舒服乐观，中国的命运也就完了。因为“勿谈政治”“闭门读书”等等的美字样，实不过盖藏些我们民族